

王也扬 著

我们关心的历史

THE HISTORY WE CARE ABOU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们关心的历史

王也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关心的历史/王也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1

ISBN 7-5004-4153-3

I. 我… II. 王…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
②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000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李云丽
封面设计 师若夫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量变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滞缓，内部的资本主义“要素”不得解放，原因可从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去探究。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直接因素是列强入侵和由此造成的民族危机，近代化的量变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前者为主导，影响并带动后者。本文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有直线也有曲线，一些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有的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有的则走了曲折和迂回的道路，不得不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来解决问题。

戊戌变法：近代中国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

甲午战后，中国社会上下曾出现过一次空前一致的政治局面，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总督巡抚到民间知识分子，变法维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清政府不再坚持洋务运动时期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政策，而转向鼓励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恤商惠工”政策，这是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改革举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本文认为，19世纪末中国实行变法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不逊于日本明治维新，有些条件甚至优于日本。如果这一历史时期的安定局面得以保持，中国的近

代化步伐本不至耽误太多。可惜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在政治运作上出现人为失误，使近代中国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招致挫折，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20 世纪初中国进步思想界对奴隶主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进步思想界曾以西方的启蒙思想作为武器，对本民族的“奴隶根性”这种病态精神现象展开猛烈地批判，由此又导出了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讨论。

论中国踏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以往我国学术界注重本国社会与西欧社会的共性研究，如对奴隶制、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倾力甚多，以此来说明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于中国。然而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其更多的答案却应该从中国自身来寻找。本文从传统“大同”思想的传承演变和近代中国激进民主主义的兴起作为切入点，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并把发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联系起来，立于今天世纪之交的高度，重新作出整体的检视，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可以为生产力的解放开辟道路，却不能替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权，可以为改造社会创造条件，却不意味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美好理想，是社会进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却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搞“直接过渡”。

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研究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力图从中为今天的政策寻找某种理论的根据，这种研究引发了激烈地论争。还有一些读者提出问题：既然当年的新民

主义纲领最适合中国的实际，为什么要把它提前结束？既然毛泽东对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有深刻的认识，为什么建国后又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本文通过历史地考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回答了读者在这方面存在的疑问，也使围绕这一问题的论争，有了解决的一个研究方向。

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

1956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之下，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文化科学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次年，便发生了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关于这段历史，国内史家惯用“逆转”一词。而“阳谋”之说，则成为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心中一个难解的结。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关于“双百”思想的比较全面的研究，给了这段历史以理性的解释。

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

国内学术界多从经济建设的视角研究“大跃进”，本文则从政治的视角研究这段历史，指出，根据以往革命胜利的经验，试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经济建设，走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自己的路”，是毛泽东关于“大跃进”思想的基本思路。一般认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确立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本文则以史实表明：“反右”之后，毛泽东即开始了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尽管尚未正式提出这个口号）的大规模尝试，这正是“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特征。这样，史家和民众对“大跃进”运动长期存在的一些历史疑问便获得了客观而理性的解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了令人信服的铺垫。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在急切呼唤革命的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被引入和被接受，成为发动和进行革命的锐利武器，有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为毕生事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不迷信本本教条，注重实际的对敌斗争，运用辩证法、矛盾论，结合本民族传统的政治智慧，以高超的战略策略，带领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与马克思主义文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存在差距，残酷的对敌斗争又牵制着人们首先必须考虑怎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的局限性也毋庸讳言，他倾力研究有关于如何战胜敌人的辩证法、矛盾论，所获甚丰；却对作为阶级斗争学说基础理论的唯物史观知之有限。建国后，其矛盾普遍性的哲学和主要着眼于思想、政治的阶级斗争观点，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于使整个国家陷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实在太丰富了。

中国政坛：1976年至1998年札记

1. “四人帮”成阶下囚，邓小平复出，国家进入新时期。
2. “八九风波”，两任总书记先后下台。
3.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第三代领导核心。

康、梁与史学致用

戊戌维新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史学救国运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明最多者为史学”，他的有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俄大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法国革命记》和一系列“上皇帝书”都是含有重要史学观点或以史学为基本内容的著作，这些著作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有的甚至直接触动了中国的最高统

治者——皇帝，成为“百日维新”的理论和政策依据。变法失败后，康的学生梁启超成为在中国宣传西方启蒙思想的旗手，他大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正是康、梁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把史学致用问题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以救国功利主义为特征的一代史学，并对后世的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略论我国史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境界

本文论述了中国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三个境界：一、在革命年代，以史学致用、革命功利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二、新时期前期，以“拨乱反正、求真辨伪”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再学习运动；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实质的追求成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学习境界。

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

本文就唯物史观在我国流行的（也是人们讨论和疑惑最多的）几个问题：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史观；“人们创造历史”与“人民创造历史”；“生产力决定”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等，阐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指出，马、恩所揭示的从经济入手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早已为各国学术界所接受，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也是公认的。人们的疑问主要来自唯物史观流行理论中那些僵化的教条。而这种僵化教条的产生，又不能不说与作为学术的唯物史观同政治的不解之缘有关系。

目 录

内容提要	(1)
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量变	(1)
戊戌变法：近代中国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	(12)
20 世纪初中国进步思想界对奴隶主义的批判	(21)
论中国踏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世纪之交，侧重于思想史的回顾	(34)
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	(64)
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	(85)
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	(111)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130)
中国政坛：1976 年至 1998 年札记	(174)
康、梁与史学致用	(239)
略论我国史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境界	(255)
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	
——兼评《历史研究》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	(268)
走出“庐山”看“庐山”	(285)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下限及其他	(287)
“老照片”引出的史学话题	
——关于历史学理论的断想	(292)
谈谈史学翻案文章	(299)
后记	(303)

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量变

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近代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质的飞跃到来之前，社会处于一种不显著的、潜在的量变之中。物质的量变可以用物质的手段来测定、计算，精神的量变则更复杂、微妙，只能以精神的方式去分析、思辨。

生产技术的点滴进步，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终于导致封建经济的瓦解。由生产的简单协作，到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横空出世。“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①从资产阶级早期的经济平等要求到人道主义思潮，到民主政治思想，最后酿成资产阶级革命。这是西方社会比较典型的演进线索。

用这一线索衡量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会发现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明清时代，在手工业和商业中，确已能够看见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然而，三个多世纪过去，萌芽自生自灭，难以长成，其量的积聚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西方封建社会末期的那幅图景：大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强有力的市民阶级的形成，封建制瓦解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大变动，资本原始积累；政治上，贵族制被等级君主制所代替，王权与市民阶级的联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相当规模的“资产阶级解放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早期文艺复兴和蓬勃的异端运动等等，在中国似乎都未成样子或者根本没有出现过。中国的商业和手工业素来发达，但其主体始终是官营，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私人工商业只能在夹缝里挣扎。中国的城市早已有之，但历来是封建政治、军事中心和统治阶级的居住地。明清虽有零星的工商业城市出现，如景德镇，可那里的空气并不自由，也没有形成市民阶级，更谈不上对全国的经济、政治生活起支配控制作用。秦汉以来形成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在明清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完善。与此相应，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口突破四亿，创造历史的纪录，从一个侧面也证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合的。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滞缓，内部的资本主义“要素”不得解放，原因可从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去探究。历经数千年，建立在小农和地主经济基础之上，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官绅商三位一体，政权、族权、神权紧密结合而异常坚固；又以土地自由买卖和科举取士而富有弹性。它有效地压抑和扼制社会中新的异己力量的产生，并使这种力量不断地自我消弭，从而无法实现量的足够积聚和质的突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①也是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国策。颁禁海令以杜绝对外贸易，兴文字狱以禁锢人心，推行重本抑末政策以保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切使无论本国的还是外来的新事物、新思想，格格不得其入。正是这种对内统制、对外闭锁的封建社会体系，给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带来极大的困难。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二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重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踏上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近代化道路，一个不是完全沿着原路线演进的量变质变过程开始了。除去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促使封建社会解体，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下而上发展的可能之外，这一过程在最初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逆向运动。中国战败，直接后果是政治失败，封建统治阶级首当其冲。面对入侵者的炮口，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是照旧生活下去，还是有所改变？于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与坚持守旧立场的顽固派相对立，从少数亲历事变的沿海官员起，在一部分官僚士绅中间，产生了只有以变应变，才能挽救清王朝的思想。如何以变应变？尽管见解有异，但比较一致的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维护中国的封建体制，学习西方的“长技”（当时看到的主要是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从而抵御外国的侵略，巩固国内的统治。这是一个完整的纲领。对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来说，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下，终于承认一向蔑视的“蛮夷小邦”有值得“堂堂天朝上国”师法的“长技”，确为“三千年一大变局”。这种变，看来粗浅，却划出了一个时代，有着与以往囿于经传的“变法”、改革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是由表及里地向西方学习的发轫，是中国近代化的量变的开端。这时，“中学为体”的主张非但不足为奇，而且十分自然。安身立命于封建营垒的人们不可能跨出第一步就从根本上否定自己，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他们的直感教训是“中国军器远逊外洋”（或者说制造军器的技术不如人），他们的实践和认识还仅限于此。

迈出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师夷长技”的认识后面引出了一条长长的量变轨迹：“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建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① 这种思想的演绎和嬗变是认识、实践、再认识的结果。可以看到，在具体的个别的人物身上，认识上实践上的量变往往中断于某一阶段，然而在总体上，量变又接力般地传递和延续下来。

林则徐、魏源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者，他们未及将这种思想付诸实施便先后离世。后继者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将林、魏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并且用“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提法，首次概括了“中体西用”的纲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则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发迹，得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这个纲领，变思想为现实。起初是围绕对内对外的军事目的，购买外国先进武器。不久感到买现成的“莫如觅制器之器”，便引进机器、技术，设局置厂，办起中国第一批近代军工企业。这一有限的但却是主动的对外开放，又导致其后的一系列举动：新技术需要人才，于是成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兵工厂须有资金、原材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持，继之钢铁厂、矿场、纺织厂、轮船、铁路等民用企业应运而生。经营上，最早的一批军工企业采取官办，由国家拨款，产品不计成本，结果封建的办法难以维持生产，尤其是资金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吸收私人资本，产生了“官督商办”的形式，所谓“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② 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办民用企业。“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作为中间环节的“官督商办”，集中体现了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第40页；奏稿，卷二十，第33页。

“自上而下”的特色。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基础不足，民间举办近代企业开头几无人敢试。“官督商办”的渠道一通，“既以官力扶商，亦以商力助官”，上倚“官威”，下集商股，“则众擎易举，事乃克成”，一时间认股者“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形成了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潮。就这样，从思想到行动，从引进新的生产力到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社会出现了“化分”与“化合”，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总的量变发生着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在“官督商办”企业中，一些官僚、地主、旧商人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通过投资入股，参与经营，到独立经营（由官督商办变成官商合办、以至商办），逐渐疏远和脱离他们原有的阶级和阶层，与民间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分子相会合，开始形成具有新的共同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集团。这便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与此伴随，新式学校培养了近代科技人才——新型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厂矿造就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他们自然地属于旧的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虽然，曾、李、左等人的思想和实践没有朝政治改革的方向发展，但他们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为社会进步的部分质变和质变创造了条件。同时，在另一些人那里，这种量变并没有中断。他们在“西学为用”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感受到“中体”的种种阻碍和弊端，并且通过出访、驻外等亲身经历，更深地了解了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西学自有其“体”、“用”，进而一步一步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科学技术，根本在于“政治之不立”，因此有必要进行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改革的焦点是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不同程度地达到这一认识的有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有张树声、郭嵩焘，曾纪泽等，他们中不少人原属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或下级。这个事实也说明，近代化过程的量变在具体对象上的中断是相对的，而其延续则是时代的要求和趋势。

还有一种量变，是超越具体对象的社会观念形态的近代化。这种演变更为潜移默化，影响也更深远。从“师夷长技”否定了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顽固思想起，新观念在同旧观念的激烈斗争中，逐步扩大自己阵地。鼓励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去学天文算学，实际上是对立国之本的“中学”的一种挑战。重用唐廷枢、郑观应等买办出身的商人办企业，意味着旧的人才价值观的动摇。“商战重于兵战”理论的出现，则一反几千年来“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老传统，代表了社会的新风。观念的力量是无形的，又是巨大的。当“现代工业的先驱”——铁路刚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时候，曾被统治者看做坏风水、扰社会的可怕的怪物。造铁路被视为大逆不道，“天下俗论纷纷”。1876年，清政府用二十八万两白银收购英商在上海建造的吴淞铁路，然后加以拆毁，足见保守势力之大。可是时隔九年，188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了海军衙门关于修筑津沽铁路的奏报。这种政策的转变，反映了新观念的增长和旧观念的消退。

由于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直接因素是列强入侵和由此造成的民族危机，近代化的量变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并在一段时间里以前者为主导。这使历史过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是社会新素质的成长严重地受到旧质一方的钳制和影响。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封建统治集团内部顽固派对变革的强有力的抵抗与阻挠；主张“师夷”的当权者多数抱定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目的，并且将“长技”毫不含糊地用于镇压人民。他们的“求强”、“求富”活动带有封建性和排斥民间自发资本主义的一面，连同他们的其他活动，都存在着腐败的现象。在他们身上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变”往往是保守的，有局限的，不彻底的。其中少数对旧质有所突破者，在政治上也远不够成熟。这使

得自上而下的变革（无论量变还是质变）成效不够显著，且十分脆弱。它既经不起外部帝国主义的进攻（甲午战争的失败），也顶不住内部旧质势力的围剿（戊戌维新的失败），结果中国没有能够成功地走日本明治维新式的近代化道路，历史又一次发生了迂回。

其二是社会新素质的代表者在阶级构成、立场动机、认识角度和程度上都极为错综复杂。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社会分化，在帝国主义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救亡图存的口号对全社会都有号召力。图存的出路是向西方学习。对待这一出路，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尽管想法不同，但在一个时期内可以形成一致的总倾向。顺应这个总倾向，就或多或少地代表着社会近代化的新的素质。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资政新篇》，被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们所认同，这并不奇怪。中国社会近代化是思想领先的，当中国人举目看世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完整地树立起来。这难免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有先后、深浅之分。在有人主张“西学为用”的时候，有人已经看到了“西体”的优越性；有人在思想言论上开始鼓吹政治改革，实际行动却仍在搞“求强”、“求富”。这种认识的先后之间，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着矛盾又不矛盾的情况。如果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就很难把握事物的实质。在“求强”、“求富”活动中，一部分官僚、地主、旧商人、买办、小手工业者通过投资或举办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向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化，更是一个复杂、曲折和漫长的量变过程。其间大致可以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旧质为主阶段；旧质向新质过渡阶段（或称“亦此亦彼”阶段）；新质为主阶段。判断具体对象处于某个阶段，主要看其整个经济活动中性质规定的量的比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使许多人长期在前两个阶段徘徊或终生兼有几种身份，经济成分量不易弄清，这

时，政治态度和倾向往往成为判断的主要依据。在过渡阶段，事物的性质还处于比较模糊、混沌的状态，旧质与新质之间以及新质本身的界限都很不分明。如果说在这一阶段，甚至前一阶段中，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是不切实际的。

三

关于洋务运动的论争，近年来颇为热烈，各种学术会议，大量的论著，展示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不能强求一致。百家争鸣，更有益于探索真知。但当各种意见已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之后，找准分歧的焦点，努力有所突破，还是必要的。

洋务运动研究的突破点在哪里？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再挖掘一些材料和再重复几遍成论，而在于进一步扩大视野，从新的角度和高度来观察和思考。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尝试：把研究洋务运动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结构及其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量变质变过程中找到这一历史现象的应有位置？

否定洋务运动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说它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模式呢？大概是指欧洲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自下而上发展的道路（实际上，在欧洲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循着这种典型道路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尚未进入“末期”，其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反复遭到摧残，成长极其迟缓，那时并没有洋务运动，可见阻碍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本身。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封建